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刘杰，三谷博，杨大庆等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

ISBN 7 - 80230 - 130 - 0

I. 超... II. ①刘... ②三... ③杨... III. 中日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研究 - 近代 IV. D829. 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5768 号

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
——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

著 者 / 刘 杰 三谷博 杨大庆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责任编辑 / 杨 群
责任校对 / 苏 君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2. 5
字 数 / 307 千字
版 次 /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230 - 130 - 0/K · 005
定 价 / 29. 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 · O · N · T · E · N · T · S

序 言 刘 杰 (1)

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

中日关系史的语境

——19 世纪后半叶 茂木敏夫 (3)

关系紧密化与对立的原形

——从甲午战争到“二十一条”要求的提出
..... 川岛真 (27)

“反日”、“反中”循环中的日中外交

——满洲事变前夜 刘 杰 (49)

围绕《田中奏折》的论争

——实际存在说与伪造说之间 服部龙二 (82)

“满洲国史”的争论点

——同时代与后世的观点 樋口秀实 (111)

南京残暴行为

——建设性的对话是否可能 杨大庆 (136)

汪兆铭与“南京国民政府”

——抗日战争中的“对日协力” …………… 刘 杰 (166)

为了实现和解的历史认识

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制度与论争 …………… 三谷博 (203)

中国和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相互认识 …………… 茨木智志 (227)

如何认识台湾史和日据时代 …………… 浅野丰美 (252)

战后日本的政治与慰灵 …………… 村井良太 (290)

日中间的战争赔偿和战后补偿问题

——被追问的历史认识和战后处理的方式 …… 杨志辉 (317)

历史对话与史料研究 …………… 川岛真 (348)

索 引 …………… (366)

后 记 …………… (379)

序 言

刘 杰

进入 1990 年代后，随着冷战体制的解体，出生于“二战”前的那代人逐渐退出日本社会舞台的前台，代之而起的战后一代开始掌握日本的命运。共同经历了 20 世纪战争历史的中国，也从 90 年代中期以后，进入了一个相同的时代，两国的战后一代不曾亲身经历过敌对状态，人们期待着进入一个他们建构的面向未来的信任关系基础上的新时代。

可是，虽说两国在经济与社会两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更加深化了，但是战后一代之间的共同语言反而越来越少了。造成这种隔膜的，并不是战前那代人遗留下的“战争的历史”，而是“记忆历史的方法”、“描述历史的方法”，以及“传承的方法”。这件事情说明，比起战后一代，共同经历过两国战争的那代人更容易开展对话。从 1972 年恢复邦交以来保持了 20 多年的“日中友好”的时代，是真正站在两国对过去的历史的反省的基础上，精心维护培养的结果。如果把历史当作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可以说，中国与日本曾经对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过去进行了对话。在对话中，即使未能形成共同的历史认识，也加深了对彼此的历史认识的理解。

中国从 1970 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经济连

续 20 多年快速增长，也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信息公开与学术研究的自由。宽容的社会氛围当然也影响到了历史学研究领域。“阶级斗争史观”、“近代化史观”、“多民族统一国家史观”等各种观点并存的同时，在部分历史学家之间，长期以来将排外运动与革命视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的观点受到冷落，相反，曾被认为是“反动”、“卖国”的人们以及他们推动的“洋务”及“变法”等活动，成为重新评价的热点。目前对史料的公开及利用情况，与 20 年前相比恍如隔世。由于现在能利用到各种各样的历史资料，历史学者获得了更多的与过去对话的渠道。而且，表现形式等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增加了大众描述历史的渠道。南京大屠杀与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就是在这个时期广为战后一代所知的。

获得了众多渠道能够与过去对话的中国历史学者，一面促使日本的现在与过去进行对话，一面修正了对现代日本的印象。邦交正常化当初，在中国人中，普遍认为日本是从战败的废墟中重建起来的和平国家。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中国政府认为“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毛泽东主席指出“日本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这为中国国民的对日认识起到了充分的方向性的作用。可是，随着中国社会剧烈的变化，政府赋予人们的日本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邦交正常化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 15 年间，中国历史学者在“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的思路下要求现在的日本与过去的日本展开对话，但当日本社会的“右倾化”成为普遍认识后，现在与过去对话的思路自然地就偏向于战争中日军的残暴行为了。

日本经过快速经济增长一跃成为世界顶尖级国家，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路线的同时，日本开始重新认识过去的历史观，那就是日本的近代主要是侵略的历史，以否定的态度看待这段历史的历史观。这种动向超越了历史学界，在政治、外交等方面与

“战后政治的总决算”这个口号一起渗入国民的意识中，以教科书问题与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引起的争论为表现形式，发展为与周边邻国相关的外交问题。

日本的战后一代形成的重要的历史观，可以说是“1945年的视点”。也就是说，以1945年为界，日本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的观点。战争结束以来的60年间，日本建设了民主主义的和平国家，始终处于自夸没有战争的时代，已经不再考虑退回到1945年以前的日本。这可以说是大多数国民共同意识。所以说，把曾经从事过侵略的战前日本与现代日本结合在一起讨论，这对战后一代来说难以理解。对大多数战后一代来说，考虑现在的日本社会发生的各种问题时，很自然地会用“1945年的视点”，不认为必然要超越1945年这个明确界线与战前开展对话。

与此相对，中国目前还未实现辛亥革命以来提出的“建设”（现代化）与“统一”（完成国家统一）的目标，在看待现代社会时的视点是“1911年的视点”。经过孙文领导的辛亥革命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还未完成“建设”与“统一”的目标。而且在为此目标前进的中国历史中，最大的障碍被认为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45年太平洋战争的结束对现代日本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以追求现代化与统一为目标的中国的视点，一直放在民国革命开始的1911年。可以说，两国战后一代的不同视点，加深了两国围绕历史开展对话的难度。

另一方面，宣扬日本民族的优越性与日本历史完美无缺的历史认识，强调1945年以前的战前日本与战后日本的连续性。他们批判欧美列强对亚洲的侵略，将对华侵略与对朝鲜的殖民地统治相对化，同时指责承认对亚洲各国加害历史的历史观为自虐史观。在强调战前与战后的连续性上与中国的“1911年的视点”有共同点，但由于价值取向完全相反，两国历史认识的矛盾越来越

越明显。这类民族主义的历史认识以教科书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引起了中国与韩国的警惕，并且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一起，招致日中政治关系的恶化与国民感情上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很多战后一代共有的“1945年的视点”又被这种“连续的视点”吸收，加深了国民感情上的对立。

从明确了历史认识隔阂的20多年前起，两国的研究者反复经历了历史认识跨越国境时的艰难。当意识到历史认识的距离仅靠对友好的热情难以缩短的时候，两国的人们都非常失落。这是事实。在这种现实面前，容易产生这样一种悲观情绪，认为不可能超越国界达成共有的历史认识。可是现在就放弃化解对立的努力，还为时过早。我们这些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学者认为，在互相认同“1945年的视点”与“1911年的视点”的同时，还能通过媒体就共同拥有的过去开展对话。

本书题为“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表示一方面冷静地接受两国在“历史认识”方面存在的隔阂，一方面展开了解各自“历史认识”的对话，我们认为这才是最困难、而也是最重要的步骤。

这20年来，不仅在历史学者中，日中两国学者已经开展了大量的交流与对话。这些活动基本上是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向对方传达各自的主张。在这些意义深远的活动基础上，我们要更进一步，在日中关系史的领域，发挥共有史料的长处，加深双方对话。并且，我们获得了笹川和平财团日中友好基金的支持，于2001年10月成立了“日中年轻历史学者会议”。最初这是一个以日中年轻学者为中心的宽松组织，讨论的对象是以历史问题为背景的日中两国的社会变动的情况。虽然日中间的视点各不相同，但研究会的成员能够理解对方观点的出发点与根据，而且还意识到即使是同胞之间也有极为不同的观点。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同，但大家知道可以进行温和的理性的对话，这就是宝贵的经

验。大家认为，是否可以用我们的经验与知识，填平历史认识上日中两国年轻一代的鸿沟呢？我们痛感，对现在开始逐渐乖离的两国的年轻一代，极有必要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对话环境。

本书不仅为历史学者，还为两国学习历史的人们，为关心两国关系乃至东亚未来的读者们，整理了目前为止曾被当作热点问题的、日中关系史上的代表性问题，从日中双方的视点进行了分析。研究对象的时期是从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前的 19 世纪后半期到太平洋战争的战后，直到现代。在这 150 年里，日中关系不断地呈现出敌对与合作的复杂状态，要求我们对各历史现象的认识要从多重视角出发。本书在说明各种问题成为日中间争议焦点的理由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解决争议的途径。

第 1 部“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以太平洋战争前的各时期的历史事实为研究重点，分析构成今天的日中关系基础的各事件与历史认识的框架。

第 1 章 茂木敏夫的“日中关系史的语境——19 世纪后半叶”，考察了日中两国对甲午战争前的日中关系各自认识上的一致与对立。长期以来，后人是从“守旧/开化”、“传统/近代”、“抵抗/侵略”这样的文章用语解读日中关系史的，但探寻各自时代的史料后就会发现，这种框架未必合适。文章指出，甲午战争后，逐渐形成了两项对立的发展图式，甚至在明治初年都可以适用，它限制了对蕴藏了多种可能性的 19 世纪后半期的日中关系史的理解，并且影响至今。

第 2 章 川岛真的“关系紧密化与对立的原型——从甲午战争到‘二十一条’要求的提出”，从“中国”的形成期这个观点，考察了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最初的 20 年中的日中关系。文章认为日中政治外交的基础在这个时期基本形成，并通过在现代与历史间的往返，向 100 年来日中关系的结构上的问题提出挑

战。尽管总体看来处于关系日趋密切的时期，但在政治外交军事上的关系却在不断恶化，这也是近来日中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其背后隐藏着日本 = 文明国家、中国 = 非文明国家的意识。关于中国在 20 世纪的“形成期”与在 21 世纪初期的“抬头期”的日中关系结构上的共同点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发现些什么呢？

第 3 章 刘杰的“‘反日’、‘反中’循环中的日中外交——满洲事变前夜”，通过外交交涉的过程，说明了日中关系史上“反日”与“反中”的结构。国民政府欲通过外交手段实行稳妥的国权回收运动，但在势头正旺的民族主义与排日风潮面前毫无办法。虽然想洗脱大众赋予的“卖国”的骂名，又不愿恶化与日本的关系，而日本却将中国的反日民族主义当作国民政府反日教育与反日政策的结果，报纸的夸张报道又推波助澜，因此日本人心中心中广泛地存在对华的“恐怖感”与厌恶感。这也是自五四运动以来至今存在的日中关系的结构性问题。

第 4 章 服部龙二的“围绕《田中奏折》的论争——实际存在说与伪造说之间”，分析了日中关系史上一个长期的争议点，即关于《田中奏折》的争论。田中义一首相向天皇呈上的从中国开始侵略东亚的计划这份奏折，关于其真伪的争论，文章不仅介绍了日中（包括台湾地区），还介绍了美国、俄罗斯、蒙古、印度、韩国及朝鲜的处理方式的变化，并将争论分为“真实说”、“存在说”、“伪造说”。主张“真实说”或“存在说”的，以中国与俄罗斯学者居多，日本与美国则持“伪造说”。文章在分析各种主张的根据方面，突出了强调侵略的计划性、一贯性的中国的历史观与重视多样选择与可能性的日本的历史观之间的深刻差距。

第 5 章 樋口秀实的“‘满洲国史’的争论点——同时代与后世的观点”，文章通过“满洲国”，展示了历史同时代人 with 后人之间认识上的差距。“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国，在这一点

上，日中学者之间基本没有异议，但历史的当事人却说是将其真诚地当作理想家园看待的，这是为什么呢？作者认为傀儡国家与理想家园这两个侧面是共存的，并且描绘了第三种“满洲国”像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从成立“满洲国”与“满洲国”政府施行的政策为中国东北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变化这个视角看待问题。

第6章 杨大庆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如何认识战争中的暴力”，将南京事件作为关乎历史研究本质的问题提出。由事件的刺激性，文章对不可避免的主观意识参与的历史研究的性质与现存的证据与证言的性质进行分析，指出这个以“南京大屠杀”闻名的事件，在被杀人数与杀人方法上，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但可以缩小意见的对立。那不是将单一的观点强加于对方，而是要为双方的历史研究构建建设性的框架。也就是说，追求实证主义的同时，也要以伦理道德为目标。南京残暴行为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发生的事件，可以说与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所有战争与有组织暴力与犯罪有共同的性质，以此出发，可望缓解认识上的差距。

第7章 刘杰的“汪精卫与‘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战争中的‘对日协力’”，文章围绕日中对在日本占领下的南京成立的汪精卫政权以及汪精卫其人的不同认识展开讨论。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讨论这个问题时，最终争议集中在汪精卫是不是“汉奸”，汪精卫政权是不是“傀儡政权”。汉语里甚至有“汉奸文化”这个词，可见中国人历史上对“叛徒”的憎恶是深刻的。文章分析了中国人对日中战争时为日本卖命的人的憎恶，及其理由来源，阐明了汪精卫政权对日合作与“抵抗”的事实。

第2部 “为了实现和解的历史认识”中，选取了横亘在现代社会的日中间的课题，并对未来作了展望。

第8章 三谷博的“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制度与论争”，为了中国读者理解日本的历史教育的实际情况，以及教科书审定、采

用制度的实际情况，文章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2001年以前与以后关于历史教科书的日本国内的争议。文章指出，与周边邻国重建关系，使得教科书问题具有了国际性的一面，在介绍“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主张及活动的同时也确信，即使在日本的保守势力中，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厌恶走向战争，日本的“国家利益”与包括邻国在内的国际和谐紧密联系在一起。作者认为，历史认识的问题，不是权力斗争的具体表现，应该作为普遍的道义问题处理。

第9章 茨木智志的“中国和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相互认识”，通过比较、探讨日中两国的历史教科书，再现了双方教科书中对方历史所占比重，以及以何种形式叙述历史。文章指出，“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历史观受到周边邻国的注目，但在日本，对战后出生的孩子，不仅要进行历史教育，并且一贯坚持通过社会科进行和平教育，教授和平的重要性。文章认为，作为两国历史教育的共同点，都在淡化国家自我意识，由于各种原因产生的政治要求影响历史教育的制度也正在建立。

第10章 浅野丰美的“如何认识台湾史和日据时代”，探讨了日本在台湾长达50年的“日本时代”，对现在台湾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与两岸关系留下了怎样的影响，并围绕台湾问题描述了日中之间的争议。文章指出，将台湾人当作“民主”与“自由”的主体，并欲通过历史将其正当化的言论，被中国大陆方面作为“文化台独”（从文化方面企图台湾“独立”）所驳斥；并指出，日本的“民族式保守派”强调日本人对台湾的“近代化”做出了一定贡献，它与台湾的“独立派”互相承认了历史上的联系。

第11章 村井良太的“战后日本的政治与慰灵”，将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当作围绕政治与慰灵的后日本半个世纪的经营的集中体现来理解。文章将靖国神社问题共分为3期，第1

期是战死者的安魂问题（早期合祀、国家护持）与宪法问题相冲突，第2期是为了落实正式参拜，与周边邻国尤其是中国发展到了外交问题，第3期是靖国神社问题从宪法问题决定性变质为国际问题，开始讨论将建设新设施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通过整理政治与慰灵的历史，阐明了国内与国际就此问题的争议之处。

第12章 杨志辉的“日中间的战争赔偿和战后补偿问题”，指出中国政府对日本放弃要求战争赔偿的决定，成为民间发起的战后补偿问题的一个原因。明确了战后补偿问题的扩大是与中国社会自由度的扩大相关的。向来慎重的中国政府也改变态度，认为要求补偿是国民的权利，政府不能干涉，所以事实上也是支持民间的行动的。文章认为在日中间关于历史认识的对立中，中方在补偿问题上如此坚持，是要求日方对战争进行反省，而不在于物质与金钱上的要求。

第13章 川岛真的“历史对话与史料研究”，对如何谋求超越国界的历史认识作了探索。作者强调，在中国关于战争受害的记忆形成于地区、家庭等私人性的空间中，指出日中之间开展“对话”、形成共同历史观的难度；并指出，应该认识到，不论怎样根据史料开展“实证”研究，也未必能解决问题。但另一方面，也介绍了中国历史学界讨论框架的扩大，以及研究课题的自由化、多样化，实证主义的进展，世界对中国研究的担忧、意识的变化等，认为正在产生新的对话、共同研究的可能性，表达了对未来的展望。

本书的日文版与中文版同时出版。近年来，为了消除东亚在历史认识上的隔阂，编写了许多共同历史读本，其中不仅有面向孩子的，还有面向成年人的读本。虽然仍有许多做得不够的地方，但是我们希望它能够两国人们开展对话提供好的环境出一份力。曾有过敌对历史的两国国民在历史认识上产生隔阂是件客

观事实。而且，加害者与受害者的不同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但不能强行要求对方顺应自己的历史认识。可是，回首历史本身，是个“心灵的问题”。体谅对方的“心灵”，倾听、尊重对方的主张，才是日本与中国真正实现和解的第一步吧。

最后，为了加深日中两国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关系，笹川和平财团为研究会的召开与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慨允出版、倾力编辑翻译此书的东京大学出版会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深表谢意。

刘 杰

2006年3月

中日关系史的语境

——19 世纪后半叶

茂木敏夫

前 言

关于日本和中国确立近代外交关系的、即从 1871 年缔结日中修好条规至 1894 ~ 1895 年甲午战争的 19 世纪后期的日中关系史，中日两国之间既有共识也有对立。本文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我认为这个论题必须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日中交流以及作为其背景的东亚地区的时代脉络，其二是甲午战争后后人对此的认识和表述。这两个层面的问题，人们往往不加区分地混同而论。因此，本文将首先解明对 19 世纪日中关系史代表性的表述是基于何种认识框架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确认在该时代的脉络中是否存在这种认识框架，假设不存在，我们将探讨在该时代中当事者是如何思考的，又是如何行动的，其理论基础又是什么。

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凭固定观念而做出裁断的弊端，重新审视在甲午战争后的 20 世纪所形成的历史认识框架到底为何物。而认清了近代日本和中国所存在的可能性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构想未来时发挥更自由的想象。

一 “开化/守旧、侵略/抵抗” 定式的形成

甲午战争时期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其回忆录《蹇蹇录》中，认为引发这场战争的“日清两国围绕朝鲜的权力争夺”是在中国—朝鲜宗属关系问题上的新旧两个世界秩序的对立。他这样回忆道：

总之，日清两国对于如何维持其在朝鲜的权力已呈水火不容之势。日本一开始就承认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意图断绝清朝与朝鲜之间业已存在的暧昧宗属关系。相反，清朝依据既往的关系欲大致表明朝鲜是自己的属邦，尽管事实上清朝和朝鲜的关系缺乏普通公法上确定宗主国和附属国关系所需的必要要素，但清朝仍努力地要名义上将朝鲜视为其属邦。（岩波文库新订版，第27页）

我们可以将以既往关系为依据的清国和早就接纳了近代世界“普通公法”的日本之间的关系描绘为两个世界秩序的对立，清国是“往昔”的、是守旧、传统的，如果将两国的对立关系置于“守旧的中国”和“开化的日本”这种价值结构下的话，那么就可以证明日本的立场具有正当性。若依据社会进化论的尺度，在如何实现近代化的时代背景下，那么在这种新旧对立的格局中，无疑“新”更具有正当性。

其实中国内部也有这种表述方式，例如王信中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国立清华大学，1937）就有如下叙述：

就中韩宗属关系言，中国之于朝鲜，向只维持宗属之名，而于其内政外交，素不顾问，然此种畸形宗属关系只可

维持于昔日之闭关时代而不能适用于国际关系复杂之 19 世纪。盖按照国际惯例，宗主国对于属国之内政外交，而尤以外交为最，不但有干涉之权利，且有干涉之义务。中国于朝鲜既放弃此种权利与义务，则各国即不承认中韩之宗属关系。而朝鲜问题之发生，肇因于此矣。（第 4~5 页）

王信中按照近代世界的关系准则，认为中国和朝鲜间传统的宗属关系，是“畸形宗属关系”，加以一种否定性的评价。

在欧美列强的在华势力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有所下降之际，日本见缝插针般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其对华态度从以往与列强步调一致的干预转向日本一国单独干预。关于这一时期的日中关系，中国表述为“侵略的日本和抵抗的中国”，日本则是“先进的日本和落后的中国”、“能够建立统一国家的日本和分裂的无法建立统一国家的中国”这种二者对立的模式化表述。后来，日中两国对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日中关系的相互认识逐步定型，这是由于日中双方过去的定式化认识而形成的。

这一时期关于甲午战争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将精力集中于解析战争败因，在揭露了日本的侵略性的同时，也暴露了中国拘泥于传统的守旧性。19 世纪中叶后的日本和中国，就按照“近代与传统”、“侵略与抵抗”这样的观点被定型化。中国方面认为日本一贯具有侵略意图，这是不言自明的前提，而且这种意图和政策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之前，选择适当的史料而表述日中关系史。

例如，这一时期编纂的近代日中关系史经典著作——王芸生编《60 年来中国与日本》（全 7 卷，大公报社，1932~1934。后增至 8 卷，由三联书店重刊，1979~1982。部分译文由长野熏、波多野乾一编译，建设社，1933）一书，在张炽章于民国 21 年 4 月（1932）所写的序言中，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提出了为何 60 年前毫不起眼的岛国——日本经过“甲午之败、庚子之危、二十一条之

羞、济南惨杀之痛”而会形成如此的威胁这一问题，作者追溯至 60 年前的日清修好条规，从那段历史时期的日中关系分析了原因，希望唤起《大公报》读者救国雪耻的决心。作者采取了探究侵略起源和唤起民族主义的方式，一直追溯到甲午战争前的、即 60 年前的日清修好条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以“日本的侵略和中国的抵抗”这一框架为基础，将近代日中关系纳入日清修好条规至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历程中分析其起因，是一种典型的表述方式，这是基于当时以满洲事变的危机意识为背景的切实状况。

战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历史研究中，抗日战争这一认识定位依然没有改变。而且，以批判战前的法西斯主义和侵略大陆为开端的战后日本研究，也最终照应了这种定型化。这样，近代日中关系史就被表述为遭受侵略的“传统的中国”和施行侵略的“近代的日本”。

但是，陆奥指出 19 世纪后期日本成为近代国家、中国依然是传统国家，二者是“水火不容”的排他性关系，果真如此吗？事实决非如此。稍加分析我们就能理解到，日本和中国虽然标榜近代但仍有传统的痕迹，它们所重视的传统又因受到近代的影响和约束而被重新定义，而且它们有时又有意识地地区别使用传统和近代。下面，我们就通过史料来分析日中围绕缔结日清修好条规进行的谈判、明治日本对琉球王国的合并和废藩置县（“琉球处分”）、日中围绕朝鲜所产生的分歧等问题吧。

二 传统的文化世界共鸣——日清修好条规

明治初年，因为日本通过对马藩递交朝鲜的王政复古告知书中含有“皇”、“敕”等文字，朝鲜认为这违反了以往的“抗礼（对等）关系”而一直拒绝接受。因为对于朝鲜而言，“皇”、“敕”等文字只能是册封朝鲜国王的中国皇帝才能使用的。由于这